

2207



彭水
水之史

(第九辑)

政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彭水文史

(第九辑)

第
九
辑



政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本 辑 编 委

主 编	编 委	孔庆余	孔庆余	梁 昌 明	杨洁（女）
责任编辑	校 对	蔡盛焯	杨 洁	阮国贤	
封面题字		杨 洁	刘应平	梁昌明	蔡盛焯
		任 向 锋		刘 小 梅	（女）

7665/13

彭水文史（第九辑）

字数9万字

内部报刊准印证

彭自文字第96011—1号

工本费8.00元

似進血輯史
鳥康氏字百彭
江莊族字花水
長圍凝若好
流結心九文

彭水文卷贈

丙子不雪

沈元瀚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沈元瀚题词

前 言

我县文史工作，自县政协成立之日起，已开展十又七年。十七年来，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计划、组织和推动自晚清戊戌以来文史资料的撰写、征集、整理、编印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使文史资料在“存史、资政、育人”和促进我县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政协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重心已移至建国之后时期。为尽快落实“两会”精神，实现重心转移，我们在本辑内，把几篇建国后的资料重点刊载，其首篇《回忆解放初期在刘邓贺领导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干部的优良作风》，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可贵的亲历资料，对我们贯彻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属于建国后资料的，还有《“农业学大寨”在桑柘乡》、《鹿角索桥修建始末》等，因事出当代，皆为我辈亲历，其诚且真的资料记述不仅能以资存史，而就其蕴涵亦应有其重要的资政作用。

为使文史资料征集时期的重点转移至建国后，我们有必要把建国前，特别是清末民初我县的一些资料进行清理和编印，使这些难得的资料不致缺失，于是本辑特刊出了以前各辑尚未见载的若干关于我县政治、经济、交通、军事、教育、科技、人文等，甚至涉及习俗风化和县内一些典型人物的身家轶事的资料。这些资料涵盖面广，内容丰实，蕴意厚重，较有价值，且撰者或述者多近古稀，若不及时印存，将留或失

之憾，为我辈不堪设想者。今得而刊之，实为幸也。

需特提一笔的是，于此辑编印之前，我们的一位特约资深资料搜集和撰稿人王国甫于笔案间不幸辞世，使我们原可从他那里得到的许多宝贵资料已随之泯失，这对我们无疑是一大损失。我们于本辑内特刊出我委副主任蔡盛炽先生《探芳信》词一首以表悼念。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目 录

回忆解放初期在刘邓贺领导下的 西南军政委员会干部的优良作风.....	王天午 (1)
回忆川东学运(片段).....	王天午 (6)
鹿角索桥修建始末.....	肖尧荣 (10)
“农业学大寨”在桑柘乡.....	王国甫 (13)
地震的宏观异常.....	陈 进 (17)
彭水港今昔谈.....	阮国贤 (19)
冉崇文轶事.....	蔡盛炽 (23)
一代名医肖佐才二、三事.....	肖隆文 (30)
丛莽里开辟出来的文明 ——无私漢冉氏的崛起.....	蔡盛炽 (32)
苏拣卿和芦塘煤矿.....	蔡盛炽 (47)
从郁江到乌江 ——钱注铭的驾船生涯.....	蔡盛炽 (50)
贫民学子邓增龄.....	蔡盛炽 (53)
田兴文和“野猪队”.....	蔡盛炽 (58)
半日都督——赵城.....	蔡盛炽 (63)
袍哥大爷王巨卿.....	蔡盛炽 (66)
黄介臣和空明精舍.....	蔡盛炽 (70)
廖玉堂其人.....	肖尧荣 (73)
彭水的乡村私塾.....	肖尧荣 (78)
解放前乌江的盐运.....	蔡盛炽 (81)

乌江的“歪屁股”盐船.....	肖尧荣	(90)
县坝盐灶始末	罗文锦	(94)
郁山旧闻	王国甫	(96)
王伟堂劝息讼		
郁山镇出票纸始末		
盐城知事受辱		
四字匾额费踌躇		
牛滚凼的衰落和走马岭的兴起.....	蔡盛炽	(103)
彭水县在民国时期的“民社党”		
“青年党”“三青团”建立情况.....	王国甫	(109)
彭水县两次鼎革侧记	王国甫	(112)
附：探芳信 <small>文国甫</small>	蔡盛炽	(116)
神秘的“军械库”	罗文锦	(117)
万足历史事件追忆	肖尧荣	(119)
暗杀乡长		
打南川保安队		
商业兴衰		
文苑拾遗		
彭水蒙古族	蔡盛炽	(132)
附：彭水地名诗联录	何廷应	(136)

回忆解放初期 在刘邓贺领导下的西南 军政委员会干部的优良作风

王天午

一九四九年底，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我军势如破竹，解放了大西南。国民党的所谓总统府，也于此时在重庆全部接收。蒋军企图在西南作最后挣扎的梦想，也彻底破灭。当然，全国除台湾、海南、西藏外，已全部解放。

西南，继几个大区之后，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管辖云、贵、西康、西藏和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及重庆市。以刘邓贺及宋（任穷）为首，主管西南党政军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是大区人民政府，且有军管之权。四九年我大学毕业后，经军干校（42军校）和西南革大学习之后，分在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任秘书工作，有幸在刘邓贺等高级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有幸参加党政有关会议。

西南是最后解放，各种条件较差，国民党军特留下搞破坏的特多，土匪特别猖獗（实际是国民党的武装队伍）。要跟上全国的步伐，困难较大，特别是干部少，任务繁重，清匪反霸，土改肃反，争取财经好转……。西南办公厅如此重要的首脑核心单位，除少数老干部外，其余就是学生干部，再就是总统府留用的人员。虽然当时的领导、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秘书处长（都是军师级干部）及我们学生干部多数都是大学生，有文化，但对高级机关的管理、公文处理比较

生疏。夺取政权后，建立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对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由于领导政策水平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我们积极学习，很快掌握并胜任了秘书工作，起了参谋作用。工作效率、质量至今回忆起来仍是高水平的。一般公文，从收到批复、发出，不超出三天。重要公文，一般不得超过七天。公文审批程序是：秘书拟稿，科、处长审核文稿，主任、秘书长批发，有时甚至送小平、贺总批发，要经过四、五级。秘书，每人每天一般办文10件左右，当天办不完，晚上加班也要办完，不能把今天的工作，推到明天。自己办的文稿，一定要反复修改完善后，才能送上级审核。领导审核，主要是从政策上考虑，文章字句均由拟稿人推敲。开委员大会当记录，更是紧张。上午记录，下午整理，夜间打好印完，第二天发大会讨论，绝不能迟延交卷。加班超过夜间12点，厨房一碗面条充饥，无分文加班费。不到12点，则面条也吃不上。

刚解放时，物质条件很差，我们除发灰粗布衣服外，别无其它。当时是供给制，我享受副营待遇，五0年每月津贴1元，有时外出饿了，只有资格吃碗小面（八分）。后为五元，到一九五三年大概是三十余元。有时有点稿费，都捐献抗美援朝买飞机了。领导提出将我的工资改为薪给制，我婉言谢绝了。因在那个年代是以苦为荣，精神上十分愉快。

我们办公厅领导及学生干部，唯一的“享受”就是每周星期六晚上参加机关舞会，消除一周的紧张疲劳。贺帅、孙（志远）秘书长等领导都很重视体育及文娱活动。贺总虽年已60余岁，也喜欢跳舞。这也是领导联系群众的机会。工作要求很严，但一起文娱的时候，并没有你是元帅我是兵的感觉。军师级的领导对我们没有一点官腔、官架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秘书长（原王震兵团政治部主任，后调国务院任

副秘书长及三机部长)博学多才,作大报告多是他讲,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逻辑性很强,我作记录时,也下笔如有神。当时重庆很多教授、学者、高级民主人士听了他的报告,无不敬佩他的才华出众,均公认共产党内有人才(当时都谣传共产党是土包子,无文化)。当时,每周对党外部长以上干部有一次学习座谈会,收到了思想改造应有的效果。但不是生硬的教条式的方法,更不是强迫、盛气凌人的方法。党内干部均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无不从内心深处拥护共产党。从刘邓贺到我们,无一人有特权思想,有特权作风,都是严于对己,宽以待人。

三位首长的亲属,凡参加革命工作,一律以其德才及资历由组织部门分配工作,没有后门之事。小平的幺兄弟参加革大学习后,被分在贵州一个边远县作一般工作(条件还不如彭水)。小平的夫人,是一位参加革命较早的大学生,重庆解放时,安排在西南人民小学任校长,贺总的夫人安排在妇联工作。这二位领导的夫人都是在无权无钱的岗位上。

时间观念强,办事效率高。人们都自觉遵守作息时间,一般都提前上班,没有迟到、早退。部长级干部也不例外。军政委员会每周开行政例会一次,讨论重大问题及人事任免。小平和贺总主持会议(刘帅虽为军政委员会主席,不久即调南京高级军事学院任院长),没有一个部长、委员迟到,至少提前三分钟到会。部长的工作干不好,也要受批评。有一次贺总就批评了农业部长。当时的部长、省长如今尚健在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宋任穷;省领导人有知名的将军陈赓、苏振华、杨勇、陈锡联、秦基伟等;军政委员有中外知名数学家何鲁教授,有楚图南、潘大逵教授,有中外知名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党内最年轻的省级干部有胡耀邦同志(川北行署主任,30余岁);起义将领有刘文辉、

邓锡侯、卢汉，他们以前是唯我独尊的西康王、四川王、云南王，参加革命后都自觉遵纪守时。其原因是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党内干部起了带头作用，作到了移风易俗，收到了焕然一新的效果。雷厉风行，没有拖拉现象，人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如此。

一心为革命，钱财如粪土。一位起义将领（当时为军政委员会参事、高级干部）将自己收藏的一幅十分贵重的字画（有几朝皇帝印章），出于友谊，欲送给秘书长，后被婉言谢绝。一战犯的小老婆去台时，时间匆忙，数千两黄金及二万多银元未能带走，领导派我们几位机要秘书前去接收，放入保险柜，再交人行。我是第一次见到金砖，见到如此多的黄金、白银。当时手续并不完善，但我们无一人拿一两一钱。

纪律严格，赏罚分明。当时西南有一单位的秘书长（相当于副部级，二十年代参加革命）因恋爱不当（对方可能有特嫌），不听组织劝阻，后降为一般干部，下放南充图书馆。办公厅一会计，“三反”时被判了刑，不久发现是冤案，及时平了反，同时在政治上、使用方面还特别作了善后工作，使他本人及群众深感党的政策伟大，真正作到了有错必纠，政策兑现。

保密工作，严格遵守。我经办机密文件多，如贸易部物价调整表，事先送军政委员会备案。我知道部些物品要提价，哪些物品要降价，但绝不外传。有次大逮捕，事前公安部报西南军政委员会备案，我看了后，即“提呈”秘书长。朝鲜战争正式谈判前一年，我参加会议，知道这一重要消息，但未与任何人讲。大家做到了不谈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在此期间，我们西南机关，还由副秘书长周钦岳为团长，组织土改团去贵州兴义县参加土改，接受锻炼，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时空了，我还给军属担水。从未劳

动过的同志，在山高路不平的贵州担水，实在困难。贵州山区十分艰苦，连理发员也没有，数月不理发、洗澡，甚至生了虱子。山区农村有土匪、有虎豹、狼，特别多，有时白天出来吃牛羊或小孩。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家工作十分愉快。我工作的村，被评为全区模范村。当时乡工作组长是孟功才同志（老红军、省建委副主任）。参加土改的同志除干部外，还有大学教授和宗教界人士。大家认为，通过劳动锻炼，在思想改造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解放初期，工作繁重，纪律严明，生活虽艰苦，但上下级关系、党群关系（领导很重视人民来信，每周要列表上报处理情况，小平同志还亲自审阅）、军民关系、同志关系都很好。无论来自各野战军、老区、白区，工农干部、学生干部都很团结，真是万众一心，群策群力。西南虽最后解放，但工作还是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至今数十年，在北京、成都，我们碰上了办公厅的同志，无不留念当时的好风气、好作风。我们相处时间虽短，但特别亲切，无论是部长或部以下的同志。有一次，我到北京去拜望原办公厅主任段云（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高干称他为党内一支笔），他还特别送给我他的书法选、诗选及一幅单条。

但是，眼见目前的一切，则都叹不已，优良作风虽难以恢复，但希不要忘记过去，革命来之不易。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此史料经当时的秘书科长、后任省展览馆馆长的吴玉琦同志审核。）

回忆川东学运（片段）

王天午

周总理曾说，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起了先锋、桥梁、骨干作用。学生们热情，不怕牺牲，有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我仅就解放前夕，川东学运（片段）回忆如下：

四八年底至四九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垮台已成定局。四八年国共谈判破裂，蒋军在重庆浮图关公开枪决了几名地下共产党员，其中雷震、涂孝文为川东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就是我们的同学。川东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破坏，我校支书吴安启等地下党同学，也先后被迫离校，创办的《良善报》也被迫停刊。在此之前，彭松涛牺牲于川东云阳县，同学盛超群也被捕牺牲。

当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大雨欲来风满楼。同学们都愤怒不已，四八年底前后，我们为了配合南京发起的全国学运及地下斗争要求，组织全校同学罢课。我为学生自治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学生首席代表。斗争策略主要是搞“合法”斗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揭露国民党腐败、贪污、反动、无能，人民反对内战。在第一线斗争的同学，以中间人物、超党派面目出现，要“内红外灰”，这是地下斗争策略。即使这样，军统特务或受其支持的少数同学对我及其他学运领导人，有时进行围攻、质问，有时甚至公开派军警特务，持枪到学校打学生，撕我们的标语。率领特务进校的是军统中校特派员李武（他打入学校，有学生身份），到我宿舍找我谈判，威胁我们，指出我们要课是非法的。我“王顾左右而言他”，理直气壮指出，同学们罢课是合法的，反迫害，反

无故开除同学是正当的，以种种理由反驳他。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国民党各派的矛盾，使其上层部分人士能支持学生。他们也用一套花言巧语，什么大学生是国家栋梁，不要作无良的牺牲……蒙骗学生。当时斗争是复杂的，敌方有军警、特务及地方势力，同时有少部分同学，有的明哲保身，有的甚至不支持学运。

近半年的罢课，揭露了国民党贪污、腐败、无能。反人民的内战，不得人心。再则，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学运唤起了群众觉悟，达到了迎接解放的目的。当时我们困难很大，随时准备被捕。上街走巷（不走小街小巷）都要前后观察，有无可疑人员跟踪。特别是生活上无保障，物价飞涨，吃饭常有断炊的可能。同学们都靠家庭供给，交通不便，家中卖了很多物资，收到的汇款已无济于事。一同学家中卖十担米，收到汇款时只能买一斗米了，哭笑不得。干革命完全是自费，无甚津贴补助。幸好同学间互通有无，相互支持。

当时的大学生生活上比较“自由”，老师很少管。一般同学年龄都在20--30岁，少部分同学30--40岁，有一定社会经验，都能自己管自己。住处也自由，在校住也可，在外住也可，相当一部分同学已结婚。要以同学身份组织大家起来斗争，十分困难，谁也不愿服从谁的领导。全靠自己平时在同学中的威信、人品、成绩、能力的影响。都是要以身作则，在困难中起带头作用，危险时要“身先士卒”（没有什么战斗队的组织）。有一次，百余军警为主及部分反罢课的同学，对我和另一个同学突然出击、围攻，要公开辩论罢课问题。我们如不出席辩论，则失去群众支持，舆论上就被动。我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好与他们舌战。我们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态度，以真理在我的精神，战胜了他们的围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全国胜利形势已在眼前，但黎明前的黑暗也使人提心吊胆，也时有抓人之事。一听警车出动声，内心也较紧张，特别是黑夜（特务捕人，多在夜间）、下川东，只有我们一所由上海内迁大学（上海法学院），孤军作战，势单力薄。于是学生会决定派我为学生首席代表到重庆活动。当时，重庆各大学正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学运。我到重庆之后，即向西南长官公署（相当大区政府）长官张群请愿，当时接见我们的是其秘书长冯若飞先生。我可时举行记者招待会，《新蜀报》、《商务日报》、《国民日报》、《新闻天地》等民办报纸，均作了报道，支持我们学生（四九年四月报载）。我同时还拜会了大法官李白申，重庆市府秘书长、知名教授、民盟西南负责人潘大逵老师，请他们支持我们。重庆各大学正筹备反内战、反饥饿的四·二一大游行。国民党难于对付学运，解放军正神速向南方及西南进军，蒋军已无力自顾，解放已是指日可待了。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长是何应钦。学生们在解放碑等地宣传，跳秧歌舞，发表各种揭露文章。现在还记得片段的有：“时间过得快如电，胜利已是三、四年，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生活这样困难？……”当时民不聊生，苛捐杂税很多。有一幅对联可以说明，“自古未闻屎上说，如今只有屁无捐。还有什么何内阁、乌龟壳。嘉陵江水清清，贪官龟儿听不听……”等等。这些打油诗，简单、易懂，如小型武器、匕首，起了不小的作用。学运，这个方面军，在敌人大后方并不亚于重炮压境。由于蒋军失去人民的支持，民心、军心涣散，真是兵败如山倒。蒋军败退的速度，比我们进军的速度还快，西南很快解放。

解放初期，我们地下党员及外围进步同学，均以其德才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吴安启在川南任宣传部长，丁在新华社，李尚猷在西南财委，吴长庚在革大（后为西南政法学院），我

在西南办公厅，卢伟在42军宣传部，现这些人均健在)。后来由于“左”及江青之流说，“川东地下党无好人”，五七年后大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个人是小，对人民损失太大。甚至知名学者、民主人士潘大遒(四川政协副主席)教授也大难难免，被打成右派。有的下放劳动死去，有的在长寿湖度过大半生，有的76年后才追认为烈士。但活着的同学，大多落实为县团级以上干部，为革命仍不减当年，发挥余热。有的任教授、大学校长、律师、会计师及党委书记、记者等。相聚之时，仍谈笑风生。在漫长的崎岖人生道路上，划了一个比较圆满无愧后人的句号，经受了各种考验。